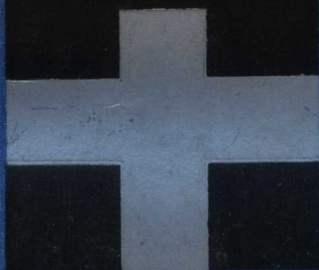


中国 教会大学史

ZHONGGUO



1850—1950

〔美〕杰西·格·卢茨著



2 033 2172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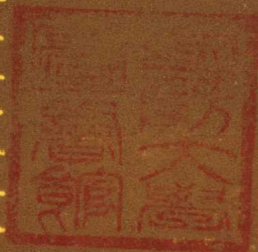
曾钜生译

中国教会大学史

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

浙江教育出版社



封面设计：杨 光

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

〔美〕杰西·格·卢茨 著

曾 钜 生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排版

（杭州莫干山路良化站）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插页4 字数377000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300

ISBN 7-5338-0299-3/G·300

定 价：3.85元

607K82/44

08

出版说明

中国的教会大学，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是我国近代史一个屈辱的标志。

如何看待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呢？一方面，它象征着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的文化侵略；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教育，尤其是大学的发展。同时，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它也被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严重挑战。

本书为我们提供了探讨上述问题的大量史实和资料，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会透过这架广角镜去全面地认识上述问题。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这部书中看到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教会大学的看法。这些，就是出版本书的目的。

1987年7月

序 言

从1850年至1950年的一百年中，中国连续的革命与新教传教士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有时是并行不悖，有时是溶合一起，有时是激烈对抗。两者相互作用的性质与频繁程度影响了这项研究的重点与材料来源。传教士是多产作家，又是资料保存者；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写下了大量日记、报道、信件和调查报告。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界直到1895年才偶尔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工作表示关注。虽然教会学校对传统的中国教育是一个明显的挑战，而这些学校仍然严重地脱离中国的知识界，也很少成为中国评论家评论的主题。到20世纪，基督教在改革中国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得到承认，基督教学校成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西方教育的样板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焦点。它们也成为中国人评论和写作的主题，特别是在20年代和5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运动期间更是如此。

我给我的题目划定了范围。我集中于新教传教士所创建的、最终成为高等学校的那些学校，而遗憾地略去了罗马天主教的学校；但是我也参阅一些天主教差会的材料，这些材料与我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

许多新教学校逐渐发展成为高等学校，而在这过程中校名与校址也是有变化的。由于不可能搞清每所学校什么时候达到学院或大学的标准，我采取各校自己采用的名称。至于有的学校多次更改校名，为简明起见，我采用最常用的一个或两个校

名。书末附有一张学校名称和地址的简明表，以供读者参考。

在这项研究进行过程中，得到许多人士的关怀，谨向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致以谢意。如果看不到许多图书馆的藏书，这项研究是无法进行的。我特别感谢下列图书馆工作人员所给予的热诚帮助：教会研究图书馆，康乃尔大学华生图书馆，新伯伦瑞克神学院图书馆，斯坦福大学战争、革命与和平胡佛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承蒙拉特格斯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给予资助，使我得以全力进行研究和写作，我感谢他们的慷慨大方。

康乃尔大学的毕乃德不吝指教与批评。他的多次帮助，是十分珍贵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已故的郭查理的帮助使我能够愉快而方便的使用联合董事会的档案。其他许多与中国差会或教会大学有联系的人士，特别是协和神学院的贝德士、康乃尔大学的哈罗德·沙迪克、圣约翰大学和东海大学的安内·科克伦、耶鲁大学的赖德烈和东海大学的吴德耀，热情地接受我的访问并与我交谈，提供资料。雷·卢茨一直坚信此项研究可以完成，并认为非常有价值，对此我表示十分感谢。

杰西·格雷科里·卢茨

于新泽西州

新伯伦瑞克

拉特格斯大学

道格拉斯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在中国遇到的对抗	1
	文化上的对抗	4
	转向教育	10
	教会学校的目标	15
第二章	起源于19世纪	23
	先 驱	23
	脆弱的生命	31
	教育使命与中国绅士	35
第三章	教育的选择机会	46
	行政与经费	46
	教师与教育方法	52
	课 程	61
	学 生	66
第四章	变革时代中的发展与巩固（1895—1925年）	75
	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与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计划	76
	清朝变法下的机会（1900—1911年）	88
	合作以后的发展（1900—1911年）	96
	发展与巩固（1911—1925年）	102

第五章	特殊的贡献	122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	124
	现代医学教育的开端	128
	教会医学院(1900—1930年)	135
	护士职业	145
 第六章	 变革时期的教育反应	 152
	影响大学发展速度的因素	152
	学生的出身	156
	学 潮	159
	大学课程：重点，扩展，问题	163
	专业和职业课程	166
	对课程的评论	173
	教员与经费	176
	学术水平	184
 第七章	 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1919—1930年)	 194
	单独的学校系统	195
	政治对抗的出现	197
	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	203
	1922年运动的领导、支持与反应	212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起因	217
	两面夹攻	222
	1925年5月30日	228
	北伐与注册	235
 第八章	 30年代的中国化与世俗化	 259

重新确定目标：为中华民族服务	263
农村重建运动与教会大学	268
影响课程重点的因素	282
新的世俗课程和兴趣	290
第九章 教会大学和30年代的学生运动	306
政治活动的低潮时期（1927—1931年）	307
满洲危机	310
“一二·九”运动的开展	319
新的青年一代对“一二·九”运动的反应	325
制定统一战线政策	329
第十章 战争的冲击（1937—1945年）	341
教会大学的迁移	342
在新环境里	352
损失	357
第十一章 内战和教会大学学生的政治活动（1945—1948年）	375
战后重新确定方向	377
努力恢复学术水平	381
政治抗议及国民党与学生的关系（1945—1946年）	386
反美问题（1946年12月）	393
走向革命	398
革命的政治取得了主导地位	405
第十二章 合并	421
转移到共产党统治	422

走向一体化(1949--1950年)	428
朝鲜战争与教会大学	436
控诉运动(1951年)	442
大陆的教会大学的消亡	446
后继者	454
第十三章 评价	465
毕业生是影响的一个标志	468
教会大学与中国民族主义	483
教会大学与新中国的创立	489
中国基督教大学一览表	506
【附录】外国人名英汉对照	510
译后记	516

第一章 在中国遇到的对抗

在19世纪和20世纪，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工作，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基督教教义或基督教会是不太感兴趣的。许多中国人与教会公开对立，把传教士和教会视为抗夷斗争的最好目标。虽然基督教团体因信徒的文盲率较低，并使一些杰出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而感自豪，但信徒的总数从未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自从共产党掌握政权，西方传教士撤离以后，中国的基督教组织，变得更为软弱无力。然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了西方文明，并影响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了解。传教士就是通过生活、通过建立学校、医院、出版机构和其它组织，传播了西方文明的理想与习俗。为了抵抗西方人的权利、特权和教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探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意义。

19世纪的传教士对这些世俗性的活动并不热心，中国学者对此也不欢迎。由于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冷漠态度，使一些传教士感到沮丧，于是他们在19世纪建立了学校和其他组织。人们认为学校首先是传教机关，其次才是教育机关。那些能为孩子们提供传统教育的中国家庭，起初对这种学校是很少注意的，但对另一些境况不好的家庭来说，学校的英语和数学教育为他们开辟了通向财富和权势的道路。同时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和某些中国领导人合作，试图对少数中国绅士进行西语、科学和数学的专门训练⁽¹⁾。

一些教会学校开始使用“学院”这一名称。尽管这种名称只表示目标而不表示学术标准，但学校确实扩大了规模，增设了课程。在20世纪初有几所学校成了传播科学、数学、英语和西方文化的教育中心。教会学校帮助创办了女子大学教育和开展医学、农学的教育科学研究，而且这些学校在其存在期间始终在这些领域保持领先的地位。其次学校发展的部分原因当然可以归之于学校的自豪感和有力地证明自己的有用性和生命力的自然愿望，但是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转变也提高了教会学校的名望。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瓦解使得一些中国人转向教会学校，并把教会学校当作学习西学的基地。另一些人则视教会学校卓越的英语教学条件为出国留学的阶梯；在到美国和英国深造的学生中，教会大学毕业生确实占了很高的比例。20世纪的差会比以前更加乐于拨款和派遣人员支援学校和其它社会服务事业。这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工作以表明基督精神，使中国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基督教化，同时学校则将间接地起着传播福音的作用。

20世纪初，中国人和西方人曾一度认为这些学校很有用处，因为不论在组织上，或在教学方法上、理想上或课程设置上这些学校都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学校。然而在大学中的洋化，以及同中国国情的脱离，冒犯了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民族运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这种意识的政治化，始终在同西方文明影响的对抗中强有力地发展着。中国的民族主义分子发动了“收回教育主权”的运动。迫使教会大学不情愿地交出了教育管理大权。从此，教会大学开始在中国政府立案，教学和行政管理的大部分职务也由中国人担任。虽然西方仍提供很多资金，但有些学校似乎在中国环境里作为合法的中西合璧的产物而被接受下来。到20世纪30年代，16所被公认为高等学校的教会

学校(其中13所基督教学校, 三所天主教学校)招收了占全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0%到15%的学生。但由于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和民族仇恨集中在美国身上, 教会大学在中国维持下去的可能性就大大地减少了。到1952年, 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教会大学都消失了, 而且大部分传教士被迫离开。差会试图总结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作出巨大努力的失败的原因。有一种解释认为基督教会过于强调社会服务事业, 而忽视了基督教义的宣传和教会工作本身。这种解释同新的正统观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 共产党政府不是简单地解散这些学校, 而是把它们与其它学校合并。有的教会大学的教职员、校舍、设备则成为新的国立大学的核心。人们可能会说, 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国有化进程已经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继续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文明; 虽然他们拒绝了基督教, 他们仍然从西方文明中改造许多东西以适应中国的需要。基督教差会同样地也没有完全抛开过去, 并于50年代在台湾和香港建立新的基督教大学。

因此, 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和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来加以研究。最初, 教会大学与中国的接触范围是比较有限的; 后来, 这些学校及其领导人开始关心起中国的局势, 并同20世纪迅速变化着的中国紧密地结合起来。它们的历史记载着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改变以及中国民族意识的发展。它们在中国革命的破坏性和建设性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并记载了中美之间既友好又敌对的关系。同时传教士的工作态度也说明了西方人士对中西文化冲突的态度的改变。正如19世纪自信的传教士热衷于宣传当时西方的力量和信念, 持自我批评的教会理论家致力于表明西方经过两次大战所丧失的活力,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以及世界帝国的分崩离析。

文化上的对抗

当然，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18世纪后期之前，交往多半是很有限的，并且时断时续。尽管双方在某些传统方面有着互相促进，中国人也学会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手段，但是双方有教养的领袖对于对方文化的了解仍是微不足道的。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国总是把西方民族列为未开化的民族，并用处理附属国的手段来处理和西方的关系。虽然中国承认有非附属国关系的贸易关系的存在，但是，对贸易港口、贸易季节的期限以及从事中西贸易的人的权利的种种限制都是来源于附属国的制度的。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国家。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形象；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描绘的图画是：这块地方有贤明的君王、漂亮的瓷器、精美的丝绸。商业冒险家们所描绘的图画则是：这里的商人精明过人，他们深不可测，但很守信用，这是一个能够赚钱的地方。这些西方人的一个共同看法是中国文化和民族有其独特性，西方的标准不适用于中国。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变得比较频繁起来。鸦片、茶叶、丝绸、棉织品的贸易迅速扩大，使西方人对于贸易的限制开始感到恼怒。同时，基督教布道团也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基督教布道团与西方政治和经济同时在19世纪得到新发展，这并不是巧合。工业化开始得最早并最发达的国家在布道方面也往往是领先的国家。在19世纪，英国和美国派出大量新教传教士，德国居第三位。法国尽管享有反宗教的名声，但在支持和保护罗马天主教布道团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首屈

一指的。交往的进步使人们看到了欧洲和美洲以外的世界。商人从遥远的地方不仅带来了商品也带来了有趣的故事。许多几乎从未听说过中国的基督徒，开始感到对“东方异教徒群众”负有责任。到19世纪90年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创造的财富，使西方社会有可能资助近两千名传教士（包括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传教。

但是，布道活动的高涨并不是对外国兴趣的增大和工业革命创造新的财富和权力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宗教的复兴，投资有可能只局限于商业和殖民地事业。在18和19世纪，教会再次苏醒，天主教徒建立或恢复了许多布道团体。天主教传道总会于1814年重新建立。天主教遣使会于1816年重建于法国，外国布道团于重建后派出第一批会员。1822年建立的宣教组织的成员宣誓每天要为外国布道团祷告，每星期捐献两生丁。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1810年只有31人，1890年有639人。^{〔2〕}

以北美的伟大觉醒和英国的福音运动为代表的宗教复兴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影响了新教的传播。卫斯理、怀特菲尔德和其他领袖强调产生于罪孽感和请求赦罪的愿望的个人情感体验。新教皈依者必须决心开始新生活，以及引导其他人皈依基督。随着运动的展开，每一个新教教派都建立起自己的布道组织。英国浸礼会首先于1792年组织一个布道会。三年后出现了伦敦布道会；起初，该布道会不属于任何教派，但后来成了英国公理会的中坚。英国国教的一个分支于1799年组织了基督教布道会。1810年在美国建立了美部会，成为公理会的主要代表，而不久美以美会和长老会也建立它们各自的组织。随着十九世纪后期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及1886年学生国外志愿传教运动的发起，许多大学生参加了布道工作。

1724年中国的雍正皇帝下令禁止基督教。在十九世纪中叶

中国和西方订立条约之前，是不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因此，1800年在中国仅有少数天主教传教士，而新教传教士一个也没有。第一个在中国居住的基督教传教士是马礼逊，他于1807年9月到达广州。由于受到敌视，马礼逊最初几年致力于学习中文；后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佣。由于普遍的敌视和中国对改宗的限制，他不得不全力翻译基督教的著作，以此作为他主要的传教活动。尽管马礼逊不久有了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同事，但在1840年，在中国工作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只有20人左右。此后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1889年有1 296人，1905年有3 445人。^{〔3〕}

布道同外交和贸易关系一样，西方要求迅速扩展，而中国人却不愿意这么快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进行改革。19世纪初，中国官方的目标是要限制而不是鼓励布道团的活动。在16、17世纪一些朝廷大臣曾对耶稣会传教士的教义及其世俗知识采取过宽容态度，但这种宽容态度在19世纪不断增长的对基督教及其使者的敌对情绪面前，开始消失了。在19世纪初期，基督教传教士不仅面临皇帝的禁教敕令，同时基督教受到中国传统势力的抵制。^{〔4〕}在反对基督教的文献中，基督教被谴责为异端，因为它是外来的，认为充满了荒谬的邪说；它反对传统的中国宗教，把自己看成是高于传统宗教之上的；并且它违背了儒家的基本教义，因而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对基督教的批评，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持续性。

西方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并不因中国官员的敌视和冷淡的态度就此灰心下来。他们坚持把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造福于中国的权利。他们要求准许西方人进入中国，反对把贸易限制在帝国边缘的一个港口上；并要求中国进入国际间的交往。中国人顽固的抵抗终于导致了军事冲突。随着鸦片战争（1839

—1842年）和英法联军（1856—1860年）而产生的条约，使西方，而不是中国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传教士协助条约的谈判，并坚持要求准许扩大传教的条件。有四项规定对传教士的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开放某些港口让外国人进行贸易和居住，准许外国人在这些港口建造房屋、医院和教堂；其次，准许持有护照的外国人到通商口岸以外的中国各地旅行；第三，准许外国人学习中文。最后，如果外国人犯法被告，他将受到自己国家的法律和一名自己政府的官员的审判。

更重要的是条约保证基督教的信仰自由和保护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不仅传教士享有这一自由而且条约隐含着为中国的信徒也提供同样的自由。1860年中法条约的中文本允许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可以购置房地产和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居住；按照最惠国的条款，新教徒很快地也取得了同样的权利。中国官员不是不知道这些让步可能引起的骚乱。这从大学士穆彰阿及其内阁成员对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评论中就可看出。在他们顺从地接受条约的一切通商条款的同时，他们对准许外国人学习中文，购买中国书籍，及在通商口岸建筑教堂和墓地等让步深感忧虑。他们要求中国当局“务使沿海居民晓然于夷言之不可效，夷礼之不可行。”^[5]随后发生的事件说明他们对于这些让步，以及1856—1860年更重大的让步的恐慌是有充分根据的。

1860年后，传教士不再只是停留在中国的外围地区活动。随着他们移向内地，并不断向乡村展开，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就不断发生。传教士一般可以依靠他们本国政府作后盾，坚持他们在条约上规定的权利和要求赔偿，同时，传教士对其信徒的保护常常使中国教徒与传教士一样都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因此，基督教布道团和不平等条约之间的共生关系，加上